



麋鶴銘

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麋鶴銘

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编

丁超一主编

江苏大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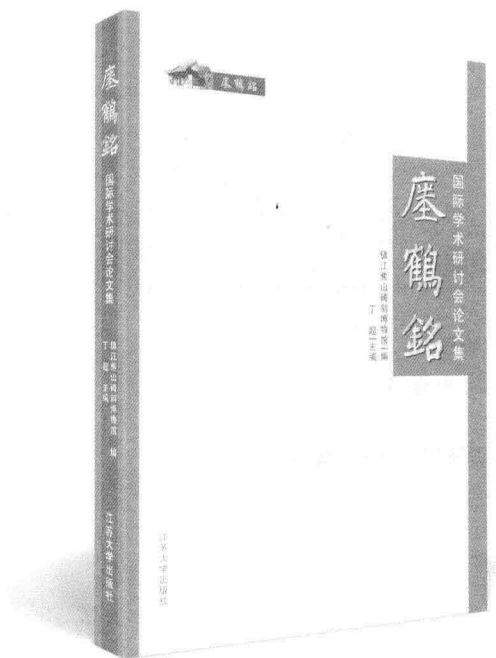


座鶴銘

国际学术研讨会
论文集

丁 超 | 主编

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 | 编



江苏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瘞鹤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/丁超主编;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编. —镇江:江苏大学出版社,2009.12
ISBN 978-7-81130-125-0

I. ①瘞… II. ①丁…②镇… III. ①楷书—碑帖—中国—南北朝时代—国际学术会议—文集 IV.
①J292.113.3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41003 号

瘞鹤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主 编/丁 超
编 者/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
责任编辑/汪再非 郭 杰 李经晶
出版发行/江苏大学出版社
地 址/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(邮编:212003)
电 话/0511-84446464
排 版/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/丹阳市教育印刷厂
经 销/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/720 mm×1 000 mm 1/16
印 张/17.25
字 数/300 千字
版 次/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/ISBN 978-7-81130-125-0
定 价/36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编委会名单

主 编：丁 超

副主编：胡江苏 曹秉峰 何未艾

主 任：张 兵

副主任：王玉国

委 员：杨远辉 潘美云 屠纪军

车 好 朱任飞 刘 森

序

有着近千年历史的焦山碑林，藏有南朝以来的碑刻 500 余方，堪称“江南第一大碑林”。其中，被誉为“大字之祖”的《瘞鹤铭》，更是吸引历代文人雅士前来探访摹拓，寄情抒怀。宋代以来的米芾、陆游、吴琚等著名书画家、文学家，都因为《瘞鹤铭》的迷人魅力而在此留下脍炙人口的辞章和美不胜收的书法艺术珍品。

《瘞鹤铭》是古代高士为悼亡羽化的仙鹤而作的一篇铭文，原刻于焦山西麓临江崖壁之上。后崖石崩塌，堕于江中，遂致残损。至北宋初，因冬季水枯石出，始为人知，历经好事者寻访捶拓，声誉日隆，遂为书法史上的赫赫巨迹。对崩落江底千年而今尚存残石五块的《瘞鹤铭》残碑的时代、作者、铭文和思想艺术的研究、探讨从未停歇，并衍生出诸多的学术课题和研究学派。

2007 年，为广泛吸纳和分享国内外学术界对《瘞鹤铭》研究的新观点、新理念、新方法和新成果，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与江苏省书法家协会联合在古城镇江举办了“2007·瘞鹤铭国际学术研讨会”暨“2007·中国镇江瘞鹤铭全国书法名家邀请展”。来自国内外的 30 多位著名学者出席研讨会并提交了 30 余篇学术论文，从书法艺术、历史考据、文本钩沉等各个方面全面系统地探究和论述了《瘞鹤铭》的时代、作者、思想艺术性、书法美学等；也为 2008 年进行的《瘞鹤铭》残石的水下考古打捞工程作了充分、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准备。

己丑岁末,随着《瘞鹤铭》考古打捞大型文化行动取得阶段性的成果,《瘞鹤铭》再次集聚和触发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关注,并掀起新一轮的“瘞鹤铭热”。将“2007·瘞鹤铭国际学术研讨会”的会议交流论文付梓印行(含邵磊新提交的一篇论文),这无疑有益于文化的开放和传承、有益于城市文化品牌的传播,这也是当下我们文化工作者的一份自觉和责任。

江苏省镇江市文化局

党委书记、局长

张兵

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

目 录

《瘞鹤铭》之谜	卞孝萱/001
黄庭坚与《瘞鹤铭》	水赉佑/011
北凉沮渠氏与佛教写经——兼谈南北朝书风的差异	毛秋瑾/015
中古书法史论词语考释	王学雷/022
六朝书法品评产生的文化背景	王 俊/034
《瘞鹤铭》文本、刻本之我见	王同顺/043
《瘞鹤铭》教学质疑与辨析	孙 洵,王佩芬/056
闲谈《瘞鹤铭》水前拓本	仲 威/063
王羲之与《瘞鹤铭》——《瘞鹤铭》作者归属的重新审视	刘建国,潘美云/067
《瘞鹤铭》校补	陆宗润/078
鲁迅先生与大字之祖《瘞鹤铭》	张 岚/087
六朝时期思想文化对书法艺术的影响	余康宁/091
六朝书法文化研究之拓展综述	邱世鸿/098
情凭虚而测有 思沿想而图空——王僧虔《书赋》中的直觉性	吴川淮/107
《瘞鹤铭》书人考证	邵 磊/111
《瘞鹤铭》问题的散思	陈见东/142
清人与《瘞鹤铭》	金 丹/148
《瘞鹤铭》考证存议三题	郑为人/163

《瘞鹤铭》时代、作者肤谈·····	陶喻之/168
《瘞鹤铭》与中国古代鹤文物及鹤文化·····	顾音海/175
《瘞鹤铭》之谜初探·····	郭荣章/180
南北朝碑志的书人及其书写心态辨析	
——兼及《瘞鹤铭》署名“陶弘景”问题的探讨·····	逢成华/188
仙风道骨《瘞鹤铭》·····	贾玉书/197
黄庭坚与《瘞鹤铭》·····	梁继/202
历代文人墨客与《瘞鹤铭》·····	韩向成/212
《瘞鹤铭》的文本与语境再议·····	薛磊/221
浅说《瘞鹤铭》的历史文化意义·····	薛元明/226
《瘞鹤铭》与游戏文章·····	魏小虎/235
《瘞鹤铭》的象外之意与东晋南朝的道家文化氛围·····	何学森/239
“中国南北二铭”论·····	冯岁平,孙启祥/247
《瘞鹤铭》时代考辨·····	屠纪军/258

《瘞鹤铭》之谜

卞孝萱

镇江焦山《瘞鹤铭》是中外瞩目的著名石刻,但它是什么时代的作品,尚无定论。今从鹤与文学、碑版署名、干支纪年、文章内容、书法风格五个方面,对流传的王羲之、陶弘景、隋人、颜真卿、顾况、皮日休、王瓚七说,进行审核,纠其讹误,补其阙漏,提出新说,请中外学者指正。

一、鹤与文学

在中国文学作品里,鹤的出现频率很高。《诗·小雅·鹤鸣》描写过鹤的叫声。班固《西都赋》、左思《吴都赋》都提到过鹤。中国历代诗赋、笔记小说以鹤为题材者,不胜枚举。这里只介绍一下古典文学作品中鹤与神仙的关系。浮丘伯在《相鹤经》中称鹤为“仙人之骥驥”。传说中的神仙往往驾鹤而行,如王子乔乘鹤的故事,蔡邕的《王子乔碑》、王粲的《白鹤赋》、孙绰的《游天台山赋》、湛方生的《风赋》以及《列仙传》等均有记述。还有修道之人化鹤的故事,东晋陶潜《搜神后记》所载丁令威“学道于灵虚山,后化鹤归辽,集城门华表柱”之事最为著名。又有鹤化人的故事,见于《晋书·陶侃传》、刘敬叔《异苑》、戴君孚《广异记》等。总之,鹤被神化了,韦绚《刘宾客嘉话录》云:“人言鹤胎生,所以赋云胎化仙禽也。”《瘞鹤铭》就是把鹤当做仙禽看待的。

虽然谈鹤的文学作品多得可以汇集成一部书,但却找不到唐朝以前有瘞鹤刻铭的迹象。这是探讨《瘞鹤铭》所处时代不可回避的问题。然而自宋至清争辩《瘞鹤铭》时代的许多文章中,只有一人注意到这个问题。孙矿《书画跋跋》卷二上《碑刻·瘞鹤铭》云:“鹤死而瘞之铭之,此等好事,亦近唐人所为。”他从社会风俗的角度,探索《瘞鹤铭》的时代,很有见地。可惜他没有进行考证,尚不足以服人。

本来,墓碑铭、墓志铭都是施于真人实事的,富于创造性的古文大家韩愈首先

破了例。李观之砚,坠地而毁,埋于京师,韩愈为撰《瘞砚铭》,把为死人撰铭推广到为物。在韩愈之前,虽有为器物撰铭的悠久传统,但把毁坏了的器物,视同死了的人,瘞之铭之,是没有前例的。中唐的李观、韩愈开风气之先。

韩文的影响很大。写过《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》的晚唐皮日休,即是韩愈的崇拜者。皮日休瘞鹤撰铭的举动,与李观、韩愈之瘞砚撰铭,是一脉相承的。程嗣章《张力臣瘞鹤铭辨书后》云:“皮日休……诗集内有《悼鹤》诗,云:‘却向人间葬令威。’此瘞鹤之证也。又一诗,序云:‘华亭鹤闻之旧矣,及来吴中,以钱半千得一双,养之殆经岁,不幸为饮啄所误,经夕而卒,悼之不已,遂继以诗。’陆鲁望和云:‘更向芝田为刻铭。’……此撰铭之证也。”^①程嗣章主张皮日休书《瘞鹤铭》,论证欠精密,不能成立。但他提出皮日休有书瘞鹤撰铭的举动,比孙矿的推测进了一步,应予肯定。

主张《瘞鹤铭》是王羲之书、陶弘景书的人,既未考虑东晋、南朝萧梁有无瘞鹤刻铭的风俗,更未考虑王、陶是否爱鹤。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云:“性爱鹅。”李石《续博物志》卷七云:“陶隐居云:学道之士居山,宜养白犬、白鸡,可以辟邪。”把瘞鹤刻铭的举动,强加于爱鹅的王羲之和养白犬、白鸡的陶弘景,是难以自圆其说的。

二、碑版署名

书碑是苦差事,唐以前,达官贵人不屑为之,大多出于书佐、小吏手笔。唐太宗重视书法,亲自书碑,并常勅名家书碑,由此,书碑者不以为苦、反以为荣了。我们所看到的地上及出土的魏晋南北朝石刻,大多不署撰者、书者姓名。到了唐代,石刻上署撰者、书者姓名才逐渐形成潮流。《瘞鹤铭》当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。此铭的撰者、书者,顺应时代风气,不能不署名,却又不愿留下真姓名,所以用了别号。前人探索《瘞鹤铭》的时代,不从由汉至唐石刻署不署名的历史现象中求答案,却在“华阳真逸”、“上皇山樵人逸少”两个别号上进行曲解和武断。

欧阳修《集古录跋尾》卷十《瘞鹤铭》说:“或云华阳真逸是顾况道号。”又说:“疑前后有人同斯号者也。”赵明诚在《金石录》卷三十《跋尾·瘞鹤铭》说:“题华阳真逸撰,真逸未详其为何代人。欧阳公《集古录》云,华阳真逸是顾况道号。余遍检唐史及况文集,皆无此号,惟况撰《湖州刺史厅记》自称华阳山人尔,不知欧公何

所据也。”可见，欧阳修的猜测被赵明诚驳倒了。

黄伯思《东观余论》卷下《跋瘞鹤铭后》说：“弘景自称华阳隐居，今日真逸者，岂其别号欤？”蔡绛《西清诗话》进一步说：“余读《道藏·陶隐居外传》，号华阳真人，晚号华阳真逸。”^②文物出版社影印《道藏》第五册，有《华阳陶隐居内传》三卷，“薛萝孺子贾嵩撰”。卷上有一段话：“仲尼云，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，吾闻其语，未见其人。我今日义达无复其方，请从求志之业，乃自称华阳隐居。”贾嵩又引：“《本起录》云：绀人间书疏皆以此号代名。”《本起录》是陶弘景侄子陶翊撰，所言可信，与史传碑志亦同。蔡绛把“内传”误为“外传”，把“华阳隐居”误为“华阳真人”，又捏造了一个别号“华阳真逸”。由于《道藏》是一部大书，不是人人都能阅览的，蔡绛所谓“华阳真逸”即陶弘景的谬论，曾蒙蔽了许多人，今予以彻底拆穿。

古人别号中带华阳地名者，如华阳子、华阳生、华阳君、华阳山樵、华阳散人、华阳道人、华阳居士、华阳老人、华阳处士、华阳逸者、华阳洞叟、华阳山外人等，不胜枚举。“华阳真逸”是一个完整的别号，怎能丢掉“真逸”，只用“华阳”去牵强附会呢？！

“上皇山樵人逸少”也是一个完整的别号。王羲之、皮日休都字逸少，但都无“上皇山樵人”之称。丢掉“上皇山樵人”，只用“逸少”进行猜测，当然是徒劳的。上皇山在哪里？前人或云在会稽，或云即降真山，或云在镇江，但都举不出王羲之、陶弘景、皮日休自称“上皇山樵人”的证据。

《瘞鹤铭》的署名是：“华阳真逸撰”，“上皇山樵人逸少书”，“斧山征士、丹杨外仙尉、江阴真宰立石”。分明是五个人。主张陶弘景书《瘞鹤铭》的吴东发，接受了陶弘景号“华阳真逸”的谬说，但“华阳真逸撰”不等于陶弘景书，郝经《陵川集》卷二十《瘞鹤铭辨》云：“矧于铭中书华阳真逸撰，不书其并书也。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吴东发竟然把几个别号一齐加在陶弘景头上，他在《瘞鹤铭考》中说：“……‘征君’、‘外仙尉’皆隐居其寓其衔，‘上皇’、‘降真’皆自寓其栖隐之地，而‘丹阳’则纪其故乡也。”这样就把撰者“华阳真逸”、书者“上皇山樵人逸少”、立石者“山征士、丹杨外仙尉”（除“江阴真宰”外）都曲解为陶弘景一个人，是猜测《瘞鹤铭》署名之谜的最武断者。但吴东发无法解释陶弘景为什么要在《瘞鹤铭》石刻中用四个别号这一特殊现象，按照惯例，署“华阳真逸撰并书”不就行了吗？

翁方纲主张陶弘景书《瘞鹤铭》的意见虽不可取，但他在《瘞鹤铭考补》中还有

一段话：“以理论之，则华阳真逸、上皇山樵、江阴真宰、丹阳外仙尉之类，皆无姓名可考。自以阙疑为是。”这段话是十分清醒的。

三、干支纪年

《瘞鹤铭》序云：“壬辰岁，得于华亭。甲午岁，化于朱方。”探索《瘞鹤铭》的时代，应将壬辰、甲午两个干支，与王羲之等人的行踪进行对照，看是否符合？

晋咸和七年壬辰(332)

晋咸和九年甲午(334)

黄伯思《东观余论·跋瘞鹤铭后》云：“王逸少以晋惠帝大安二年癸亥岁生，年五十九，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岁卒。则成帝咸和九年甲午岁，逸少方年三十二。至永和七年辛亥岁，年四十九，始去会稽而闲居，则不应三十二年已自称真逸也。又未官于朝及闲居时，不在华阳，以是考之，此铭决非右军也审矣。”王羲之的生卒年，有几种不同的推算。推算生于西晋大安二年为最早，生于东晋大兴四年为最晚。黄伯思是按照王羲之最早生年推算的，如按照最晚的生年，则“甲午岁”瘞鹤之年为咸和九年，王羲之才十四岁（虚龄），绝无书写《瘞鹤铭》之理。黄伯思判断王羲之“未官于朝及闲居时，不在华阳”，是正确的。王羲之“不在华阳（茅山）”，更不在焦山，绝无书《瘞鹤铭》之事。

主张《瘞鹤铭》是王羲之所书的郝经，在《瘞鹤铭辨》中反对黄伯思说：“是大不然。其铭之年月，作文之年月也，非书之年月也。鹤瘞文成之岁，则甲午岁也，书之岁，焉知非永和之末、升平之初乎？”他假设作文在前，书写在后，拉开距离，以自圆其说，但这是徒劳的。因为《瘞鹤铭》中有王羲之卒后的事，难道是王羲之之魂写的吗？

梁天监十一年壬辰(512)

梁天监十三年甲午(514)

《东观余论·跋瘞鹤铭后》又云：“壬辰者，梁天监十一年也。甲午者，十三年也。按隐居天监七年东游海岳，权驻会稽。永嘉十一年始还茅山。十四年乙未岁，其弟子周子良仙去，为之作传。即十一、十三年正在华阳矣。”黄伯思此考，似是而非。茅山非焦山，如陶弘景是鹤的主人，为什么不把鹤留在茅山喂养，而让鹤死于

焦山，将鹤葬于焦山呢？

吴东发感到黄伯思说法有漏洞，他企图弥补这个漏洞，在《瘞鹤铭考》中说：“按隐居《许长史旧馆坛碑阴记》梁天监七年往永嘉。十年涉海。十一年夏还木溜屿。其年十月有敕迎还旧山。十三年正月至茅山。是年岁在甲午。则所谓‘甲午化于朱方’者，乃自会稽奉敕还茅山时也。于时适过焦山，因瘞鹤镌铭于此，不然何不瘞于华阳而于焦山耶？”暂且不说吴东发所谓《许长史旧馆坛碑阴记》是否可靠，据《道藏·华阳陶隐居内传》卷中：“会上使司徒慧明迎还旧岭。道中书勅相望，仍欲先生至都下。先生至晋陵，辞以疾，乃还华阳。”可见陶弘景的路线是会稽—晋陵—茅山，未经焦山。吴东发弄巧成拙，他自以为弥补了陶弘景将鹤“不瘞于华阳而于焦山”之漏洞，却暴露了陶弘景由会稽还茅山的路线与《瘞鹤铭》内容之不可调和的缺点，可谓欲盖弥彰。

蔡襄说《瘞鹤铭》“当是隋代书”^③。隋起开皇元年辛丑(581)，终义宁二年戊寅(618)，无壬辰、甲午两个干支。蔡襄说不能成立。

唐天宝十一载壬辰(752)

唐天宝十三载甲午(754)

据殷亮《颜鲁公行状》、令狐峘《颜鲁公神道碑铭》、留元刚《颜鲁公年谱》、华沅《颜鲁公官阶考》、黄本骥《颜鲁公年谱》^④等，颜真卿天宝十一年为武部员外郎，十二、十三年为平原太守，与焦山风马牛不相及。

唐元和七年壬辰(812)

唐元和九年甲午(814)

董道《广川书跋》卷六《书黄学士瘞鹤铭后》云：“顾况卒于贞元末，当元和七年为壬辰，九年为甲午，良不及也。上推壬辰岁为天宝十一载，况当儿稚，其号华阳乎？”《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》卷四上、《唐诗纪事》卷二十八、《唐才子传》卷三均云顾况至德二年进士及第，当天宝十一、十三年时，正准备应试，与《瘞鹤铭》中的求仙思想不合。顾况卒于贞元末或元和初，董道云元和七、九年“良不及也”，的确如此！

朱彝尊《曝书亭集》卷五十《书张处士瘞鹤铭辨后》云：“证为顾逋翁书。盖逋翁故宅虽在海盐之横山，而学道句曲，遂移居于此。”皇甫湜《顾况诗集序》云：“为江南郡丞累岁，脱屣无复北意，起屋于茅山。”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卷十《叙历代能

画人名·唐朝下·顾况》云：“贞元五年贬饶州司户，居茅山，以寿终。”顾况居茅山是贞元后，非天宝十一、十三年，朱彝尊不考顾况居茅山之时代，已误，更何况茅山非焦山。

唐咸通十三年壬辰(872)

唐乾符元年甲午(874)

程嗣章《张力臣瘞鹤铭辨书后》云：“袭美为唐懿宗咸通八年进士，崔璞守苏，辟为军事判官。自叙以九年从北固至姑苏，咸通十三年壬辰，僖宗乾符元年甲午，袭美正在吴中。其年相合。”^⑤此考不确。皮日休《破山龙堂记》云：“咸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，襄阳皮日休记。”《河桥赋》序云：“咸通癸巳岁，日休游河桥。”可见皮日休咸通十三年在常熟，十四年已北上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三·皮氏鹿门家钞九十卷》注：“皮日休，字袭美，咸通太常博士。”（《唐诗纪事》卷六十四同）《河桥赋》即咸通十四年皮日休入京为太常博士“游河桥”时作。乾符元年皮日休不在吴中，何来焦山瘞鹤刻铭之事？

四、文章内容

《瘞鹤铭》如是王羲之所书，就应是东晋人所撰，从文章内容进行鉴定，是必要的。李之仪《姑溪题跋》卷一《跋瘞鹤铭》云：“世以为右军书，或谓其语不类晋人，然卒不能辨也。”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卷六云：“世传以为王逸少书，然其语不类晋人，是可疑也。”刘昌诗《芦浦笔记》卷六《瘞鹤铭》云：“今考《铭》引雷门故事，按《临海记》：昔有晨飞鹤入会稽雷门鼓中，于是鼓声闻洛阳，孙斫鼓，鹤乃飞去。恩起兵攻会稽，杀逸少之子凝之，盖在安帝隆安三年，斫鼓必此时岂复有羲之谁肯遽取以为引证哉？然则非晋人文，不辨可知矣。”刘昌诗末考王羲之卒年，发言微误。孙恩杀王凝之时，王羲之已卒，《瘞鹤铭》“雷门去鼓”的典故，绝不会出现在王羲之的笔下。

陶弘景是道教茅山宗的创立者，被尊为“百代之名师”，他自称“身有仙相”，十分自信。而《瘞鹤铭》序云“天其未遂吾翔寥廓邪？奚夺之遽也”，不过是一个普通修道之人的口吻，两人身份不合。《南史·隐逸传下·陶弘景》记载陶弘景的政治地位：“武帝既早与之游，及即位后，恩礼愈笃，书问不绝，冠盖相望。……国家每有

吉凶征讨大事,无不前以咨询。月中常有数信,时人谓山中宰相。二宫及王公贵要参侯相继,赠遗未尝脱时。”萧纶《隐居贞白先生陶君碑》描述陶弘景的隐居生活:“养志山阿,多历年所。摄生既善,冥祥亦降。猛兽不据,魑魅莫逢。亭无荆棘,远同阙里。阶吐神泉,径动疏勒。于是羽人徘徊,仙客上下,鸾凤游集,芝英丰润。”这样一个声势显赫、养尊处优的地上活神仙,死了一只仙鹤,算什么呀!何以对前途丧失信心,竟然悲叹“天其未遂吾翔寥廓邪”呢?

皮日休虽有瘞鹤撰铭之事,仔细推敲,仍与《瘞鹤铭》内容不合。皮日休《华亭鹤闻之旧矣,及来吴中,以钱半千得一只,养之殆经岁,不幸为饮啄所误,经夕而卒,悼之不已,遂继以诗,南阳润卿博士、浙东德师侍御、毗陵魏不琢处士、东吴陆鲁望秀才及厚于予者,悉寄之,请垂见和》首句云:“池上低摧病不行”。从诗题、诗句看出:第一,皮日休的鹤,是在“吴中”、“池上”喂养,与华阳真逸的鹤,在焦山大自然中喂养,不合。第二,皮日休的鹤,“养之殆经岁”死,与华阳真逸的鹤,“壬辰岁,得于华亭。甲午岁,化于朱方”,不合。第三,皮日休对友人、入仕者称官衔(“博士”、“侍御”),未仕者称“处士”、“秀才”,与华阳真逸对友人,皆称“真侣”,不合。陆龟蒙《和袭美先辈悼鹤》诗有句云:“但掩丛毛穿古堞。”翁方纲《瘞鹤铭考补》指出:“则当日袭美所葬之鹤,乃依城隅葬之耳,非在焦山崖下江流乱石之间,亦可知矣。”此说有道理,但必须补充:咸通十四年皮日休已北上,他葬鹤是咸通十三年以前之事。

《瘞鹤铭》虽非皮日休之作,而时代断限大致可定。因为序与铭皆无骈俪之习,应在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取得胜利之后。

五、书法风格

从宋至清,否定《瘞鹤铭》为王羲之、陶弘景、顾况所书者,如董道《广川书跋·书黄学士瘞鹤铭后》云:“然逸少、逋翁其书可见,不与此类。……或曰《茅山碑》前一行,贞白自书,与今铭甚异,则不得为陶隐居所书。”陈继儒《妮古录》卷四云:“黄伯思以《瘞鹤铭》为陶隐居书,……谓以《朱阳帖》参之绝类,则余所不许。”杨宾《铁函斋书跋》卷三《梁陶弘景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记碑》云:“陶隐居书,见诸记载者,有《黄庭外景经》、《大洞真经隐诀》、《画版帖》、《入山帖》、《旧馆坛记》五种,而

皆未之见。缘前人多称《瘞鹤铭》是隐居笔，遂以隐居书皆《铭》一例。今观此帖，中规中矩，沉着方严，全从《劝进》、《受禅》等碑脱胎，似与《瘞鹤铭》别一结法。”

黄庭坚主张《瘞鹤铭》是王羲之所书，《豫章黄先生文集》卷二十八《题瘞鹤铭后》云：“右军曾戏为龙爪书，今不复见。余观《瘞鹤铭》势若飞动，岂其遗法耶？”所谓“龙爪书”，黄庭坚没有见过，《瘞鹤铭》“岂其遗法耶”，乃是凭空想象，毫无根据，显然不能成立。鉴赏家认为，黄庭坚“大书酷仿《瘞鹤铭》”，深得其变化之妙。如章法的对称、平衡，韵律的振颤、凝重，用笔的长横、长撇、长捺，都是从《瘞鹤铭》发展起来的。可见他主张此铭是王羲之所书，是为了表明自己的书法渊源，抬高自己的书法地位。郝经佩服黄庭坚，在《瘞鹤铭辨》中提出《瘞鹤铭》“甚多《兰亭》笔法”的观点。任何人将《兰亭序》与《瘞鹤铭》对比一下，都能看出是两种书体。黄庭坚以人所未见的“龙爪书”立论，是狡猾的；而郝经以人人可见的《兰亭序》立论，是愚蠢的。

认为《瘞鹤铭》类似唐人书法者最多，其中又分为三派。

(1) 似颜真卿。如欧阳修《集古录跋尾·瘞鹤铭》云：“按《润州图经》^⑥以为王羲之书，字亦奇特，然不类羲之笔法，而类颜鲁公，不知何人书也。”黄庭坚既主张《瘞鹤铭》是王羲之所书，又认为欧阳修的意见正确。其《题瘞鹤铭后》云：“欧阳公以鲁公书《宋文贞碑》的《瘞鹤》法，详观其笔意，审如公说。”郝经既主张《瘞鹤铭》是王羲之所书，又认为：“其准绳意匠，后世唯颜鲁公书《中兴颂》、《宋文贞公碑》为近之。”主张《瘞鹤铭》是陶弘景所书的翁方纲，其《山谷说大字无过瘞鹤铭辨》也说：“故或者遂以是铭为颜鲁公书，何者？为其中壮笔有近于《宋广平碑》也。”包世臣《艺舟双楫》既认为“可证《鹤铭》为隐居书”，又认为“杭州定庵藏宋拓《八关斋》七十二字，一见疑为《鹤铭》，始知古人《鹤铭》似颜书说有故。”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卷四《余论》则云：“鲁公书如《宋开府碑》之高浑绝俗，《八关斋》之气体雍容，昔人以为似《瘞鹤铭》者，诚为绝作。”二王书体是魏、晋式清淡的产物。初唐，从宫廷到社会，都摹仿王字。到颜真卿才“变法出新意”。应是《瘞鹤铭》的书折仿颜体，而非颜真卿仿《瘞鹤铭》。

(2) 中、晚唐人书。如安世凤《墨林快事》卷四《瘞鹤铭》云：“以为右军者，非。为隐居者，亦非。盖晋、梁二世字形尚古，今谛玩皆唐人笔意，明之乎非二公也。……必唐中、晚之人无疑。”孙矿《书画跋跋·瘞鹤铭》云：“此铭佳处，惟在字

画飞动。然笔势太纵,隋以前恐无此法,应是李北海以后笔。顾况虽无据,然唐人善书者多,如王士则《成德军》等碑笔法,与此略相似,大约唐人所书耳。”判断力最差的是郝经,他看到《瘞鹤铭》与“张嘉贞《北岳碑》……极形似”,而没有能像安世凤、孙矿那样,判断为唐人书。

(3) 疑王瓚。如赵明诚《金石录·跋尾·冬日陪群公泛舟诗》云:“在润州《瘞鹤铭》傍,其字画正同,盖一人所书也。”朱熹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六十四《书·答巩仲至》云:“焦山《瘞鹤铭》下有《冬日泛舟诗》一篇,句法既高,字体亦胜,与铭文意象,大略相似,必是一手。”黄伯思《东观余论》卷上《记与刘无言论书》云:“予又云:焦山《鹤铭》,俗传王逸少书,非也。……然此山有唐王瓚一诗刻,字画全类此铭,不知即瓚书,抑瓚学铭中字而书此诗也。刘曰:尝亲至彼观疑即瓚书也。”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卷六云:“余尝以穷冬至山中,观铭之侧近,复有唐王瓚刻诗一篇,字画差小于《鹤铭》,而笔势八法,乃与《鹤铭》极相类,意其是瓚所书也。因模一本以归,以示知书者,亦以为然。”以上四家意见,还不能肯定《瘞鹤铭》是王瓚所书,因为:王瓚诗刻署名为“谪丹阳功曹掾王瓚”,而《瘞鹤铭》署“上皇山樵人逸少书”。如皆出于王瓚手笔,为什么一署官职姓名,而另一署别号,对姓名讳莫如深呢?又据《旧唐书·地理志三》、《新唐书·地理志五》,天宝元年曲阿县改名丹阳县。从王瓚官衔看出刻诗是天宝元年后的事,至于后到哪一年,有待考证。董道云“诗在贞观中已刻铭后”,大误。黄伯思认为王瓚学《瘞鹤铭》,可取。

综合以上,《瘞鹤铭》的产生,应在受李观、韩愈瘞砚撰铭之影响而出现了皮日休瘞鹤撰铭之后,应在颜真卿新体书法风行之后,应在古文运动取得胜利之后。具体时间为唐乾符元年或五代吴国大和六年。撰者、书者、立石者是几个普通的修道之人,没有留下真实姓名。

蔡绛《西清诗话》云:“丹阳焦山断崖有《瘞鹤铭》,……自晋迄唐,论书者未尝及之。”^⑦董道《广川书跋》卷六《书瘞鹤铭后》云:“余尝怪唐人尚书学,而此名字特奇伟,宜世赏爱,而卒不见传于人。自张怀瓘、张爱宾、徐浩论书,备有古今字法,亦不见录。”又《书黄学士瘞鹤铭后》云:“或疑梁以书传逮六百年,不应如新刻于石。”他们的怀疑,也给我们以启迪:焦山《瘞鹤铭》唐末才产生,所以东晋、萧梁、隋、唐人均未提到它。经过五代乱世,到北宋才大显。北宋距唐末不远,所以石刻如新。